

良渚古城、福泉山与寺墩

——由宏观聚落、高端产品与对外交流看良渚文化的三个政体

郭明建

关键词：良渚古城 福泉山 寺墩 宏观聚落 高端产品 对外交流

KEYWORDS: Ancient Liangzhu City Fuquanshan Sidun Macro Settlement Luxury Goods External Exchange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ncient Liangzhu city region and other Liangzhu cultural regions is critical to assessing the structure and nature of Liangzhu society. Referring to related research in China and abroad, this study presents three major dimensions through which to define and assess Liangzhu polities: macro settlement patterns, th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luxury goods, and external exchanges from the core settlement. Analysis shows that ancient Liangzhu city and Sidun were polities supported by jade resources, and control of jade resources wa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behind formation of the core settle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 polity. By contrast, Fuquanshan was a competition-endogenous polity where victory in social competition was likely the main driving force. Generally, ancient Liangzhu city, Fuquanshan and Sidun were thre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polities, each of which displayed relative capabilities in long-distance external exchange.

一、关于良渚文化社会结构的探讨

20世纪70年代以来，良渚文化贵族墓地的确认和发掘引发了学界对其社会性质的持续讨论。彼时多将良渚文化视为一个整体，研究重心在其社会发展阶段。关于良渚文化各区域间的关系只附属其中：部分学者认为良渚遗址群显示出“都城”、“王室”的最高地位，或可能对其他区域有一定的管辖^[1]；部分学者或也承认遗址群的突出地位，但认为环太湖地区由不同的政治集团分别统治^[2]。

21世纪以来，伴随良渚古城、水利系统等重大发现，结合之前发掘的反山等贵族墓

地^[3]，古城区域在环太湖地区的地位日益凸显，使学界再次审视此区及整个良渚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其中以伦福儒与赵辉的论述最具代表性。伦福儒等认为，“良渚的大型公共工程和精美的随葬品是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的产物”，“将神人兽面纹看作是良渚古城甚或是以良渚为中心的更大社会单元的社群共同体的标志，也是同样有可能的”，“良渚在规模和复杂性上要超过酋邦社会”^[4]。其论述主要基于古城区域的材料，认为可“重新评估良渚作为早期国家社会代表历史地位的三个因素（古城规模、墓葬代表的社会等级、公共工程）”，其中两个因素直接涉及古城区域；即便是墓葬因素，以随葬玉器的数量和质量论，也以古城中的反山最高。赵辉关

作者：郭明建，广州市，510632，暨南大学历史学系。

于“良渚国家”的讨论更多延伸至古城区域之外，他认为“良渚古城不是一个超大的农业聚落，而是各种制造业生产、原材料和产品集散的中心以及联通它们的管理机构之所在”，“良渚古城就不仅仅是一个连同其‘畿内’的城邦国家……又透过玉琮之类的权力象征物可把握到它与这些地方中心保持着政治的、宗教的种种联系……整个良渚社会中确实存在一张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中央’联系着各个‘地方’中心的网络结构”^[5]。

综观上述50年来关于良渚社会性质的研究，可看到古城区域的发现几次刷新了对其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而古城与其他区域的关系则对认识良渚社会的整体结构和性质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总体而言，后一方面的研究相对复杂和薄弱。且笔者认为，此种研究中尚有两个重要的基础问题未被重视：第一，以玉器为衡量政治集团“地位”和实力的主要标准，是否适宜古城之外的区域；第二，高端产品外，不同区域的宏观聚落形态及其他线索，是如何体现当地政治集团的自身特点和政治结构的。这两个问题无疑对于“公正评价”其他区域甚至古城的社会地位至关重要。而在目前阶段的研究中，它们实际又指向一个更为急迫的问题，即古城之外的环太湖地区是否有独立的政体？无论它们是酋邦或早期国家。

二、政体的界定

辨识分化社会某一区域内的政体，首先要分辨其主要中心。其中聚落面积是确定中心最常用的标准，而文献记载及象征权力的印章、高规格建筑物等遗存也有重要的指示意义^[6]。相对中心，政体管控范围——“疆域”的确定更加困难（即便酋邦、早期国家的疆域并非帝国和现代一样严格），尤其难点在于确定某区域内高等聚落间的关系——究竟它们有所隶属，抑或相对独立？对此，西方和我国的研究案例中均有若干有益探

索。思路之一是宏观聚落形态的分析^[7]，西方学界较为成熟的模型是由中心位置理论等改进的XTENT分析——假定大型中心支配相距较近的小型中心，将小型聚落划归大型聚落的管控区域；同时顾及相同“等级”聚落可能规模不同的情况，较远的小型中心考虑其政治上相对独立^[8]。我国学者也大多基于类似的规模-等级模式对各区域的聚落群进行了研究，多数研究也将面积作为判定聚落等级的主要标准^[9]。但部分学者也注意到了这种做法的局限性（面积与等级并不完全对应）以及重要遗存等线索的指示作用，并参考了历史时期复杂多变的政体情况^[10]，综合研究区域内交通、资源域等因素，利用计量模型等手段，对某些区域的宏观聚落和社会网络做了更深入的探讨^[11]。

确定整体疆域的另一思路，是根据能够指示管控的遗存（如印章、度量衡器、边界防御工事等）的分布范围反推政体疆域^[12]。政体的直接标志（徽号、旗帜等）、行政行为的直接衍生物（政令、货币等）、与政府有关的高端产品或专营品、体现特定“文化”的普通器物可作为界定政体疆域的几个不同层次的指示遗存。但在具体研究中，此种方法显然需要较为丰富的资料支持，尤其在史前考古中一般要与前一思路结合进行^[13]。即便如此，与历史时期可知政体的详细边界相比，现有研究仍有一定差距。

本文对良渚文化的政体界定正是借鉴上述思路。第一，由聚落规模及重要遗存可确定某区域的主要中心聚落；其周边的聚落分布、地理环境和遗址密度等，可推断中心聚落的管控范围。第二，具有特定风格的玉器也是指示良渚文化政体疆域的主要遗存，因此对中心聚落的玉器工业及周边区域内可能的输出品的系统梳理尤为重要。而在以往良渚文化研究中，此种分析实际已经取得了许多值得借鉴的重要成果。第三，考察玉器以外的高端产品，评估各地高端产品使用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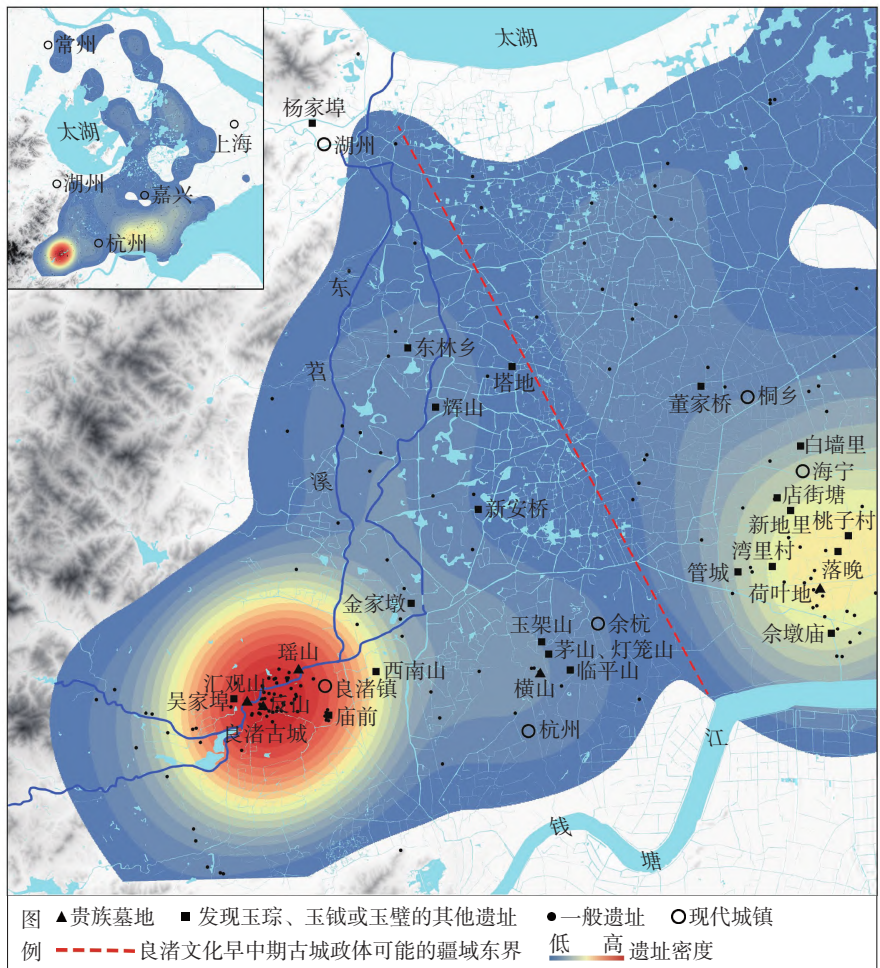
略，尤其可反映对外交流的遗物，更可作为评估政体实力的重要物证。综合以上，本文界定和评估良渚文化政体的三个主要依据即宏观聚落形态、高端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中心聚落的对外交流情况。鉴于资料的不平衡，下文将选择良渚古城、福泉山和寺墩三个材料丰富的区域开展研究。

三、良渚古城及周边区域

笔者曾对良渚文化的宏观聚落形态进行了详细研究。大体而言，一方面环太湖地区各地均有明显的聚落聚群现象，且很多聚落群之间有明显的间隔带；鉴于它们主要属于自然环境造成的自然隔离带^[14]，可认为其对于良渚文化政体的划分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另一方面，各地在聚落密度、拥有玉器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明显不平衡^[15]。

其中太湖南部地区的天目山东麓，即良渚古城所在的东苕溪流域的聚落基本呈连续分布，并与嘉兴南部的聚落群形成较明显的间隔，这一地带至今仍有一系列密集的河道湖淀。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核密度分析进一步指示出两个地区各自的中心区域，表明应有不

同的政体存在（图一）。笔者曾将东苕溪流域的聚落大致分为四群，其中西南侧即古城聚落群，其中的大型工程和大量玉器表明了超常的聚落等级。但聚落群中也有吴家埠、庙前一类普通居址及墓地，且墓地中并非都是中小型墓葬，某些墓地还有个别随葬玉璧等大中型玉器的墓葬，墓主应是古城政体控制下的基层家族或氏族的首领、祭司一类重要人物。古城聚落群外，临平山聚落群情况相对清晰，在此群中心、相距很近的玉架山、茅山、灯笼山均发现随葬玉琮、璧的墓葬，墓主也应为地方首领一类人物；但其中墓葬大多为中小型墓，显示出公共墓地的属性。东苕溪流域的其他遗址中，新安桥、西



图一 良渚古城周边区域的聚落分布和密度分析
(因良渚遗址群区域遗址众多，仅标注少数相关遗址)

南山、金家墩等也曾发现玉琮、璧等，也可能存在地方首领一类墓葬。总体看来，除古城区域，东苕溪流域均未发现类似瑶山、反山的专门贵族墓地，进一步体现出古城对整个流域的控制能力。

结合人口、资源的研究更能说明古城中心聚落的成因。赵辉认为“良渚古城绝非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周围颇为广大的地区结成了不可分割的经济体”。古城贵族需要大量粮食和劳力，估算其中人口有2万人，“需要大约800平方公里的平坦开阔地域的农业生产来满足需求”^[16]。这一“畿内”区域的面积相当于古城所在“C”形盆地，即北至大遮山，南至凤凰山，西至小古城，东至临平山一带，也即笔者划归的古城和临平山两聚落群的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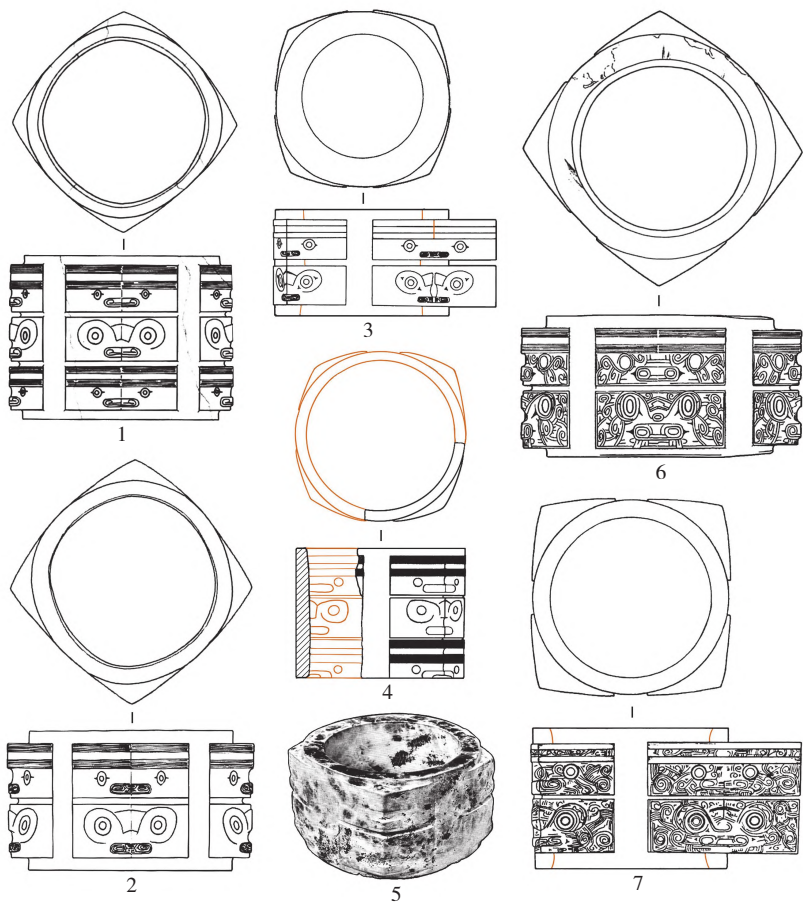
区域聚落的密度分析，尤其是地理信息系统中偏重中心区的核密度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区域人口分布及区域的向心性。分析表明，整个东苕溪流域唯有古城区域聚落异常密集（在整个环太湖地区也是最高），这应反映了古城对整个东苕溪流域的极大吸引力。然而，另一现象更应注意，即东苕溪流域并非环太湖地区平均遗址密度最大的地区，而是邻近的嘉兴南部，特别是其中的海宁西部地区，与东苕溪流域相比，那里的遗址分布更加均匀（见图一）。此外，古城区域极高的遗址密度应与充分的调查工作相关，但调查和发掘结果也显示，本区聚落并非其他区域一样——主要是墓地和普通居址，而是有很多服务于古城的、具有特殊功能的遗址^[17]。此种情况表明，古城区域聚落的极高密度并不等同于区域内常住人口的极大数量。

古城玉器工业的分析应为其中心地位的形成提供了关键性的线索。通过工艺风格可推断玉器产源和流通情况，很多学者据此认为古城为良渚文化早中期^[18]玉器的制作和分配中心，把控了此时玉器生产的大局^[19]。

以玉器数量论，古城区域良渚文化时期出土大中型玉器的比例约为环太湖地区总量的40~50%，小型玉器的比例更高。而如果仅统计古城贵族墓葬集中的良渚文化早中期，上述比例还会更高^[20]。此外，古城区域发现制玉作坊遗存，其紧邻的浙皖山地完全具备玉矿成矿条件，结合闻广提出的新石器时代玉器“就近取材”的特点^[21]，很多学者进一步推测古城玉器的原料产地可能为其西部山区^[22]。总之，上述线索都指向古城政体控制了临近的玉矿地点，天然的原料优势成就其繁盛的玉器工业。丰富的玉器资源应是古城政体形成和运作的主要动力。如此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良渚文化第四期时古城及制玉工业的巨大衰退，可能如中村慎一的推测：“在良渚神圣王权灭亡的背景里，可能隐含着与王权等值的玉料来源枯竭这个事实”^[23]。

古城玉器工业的繁盛之下，显示出其制玉用玉的若干个性。其中玉器造型和刻纹最为复杂精致，器形最为多样，与其制玉中心的地位相称。此外，本区流行冠形器、三叉形器等玉器，尤其两者数量约占环太湖地区出土总量的50~80%。且在本区，随葬玉器的使用形成规范：如冠形器在反山、瑶山、汇观山墓地每墓一件；三叉形器也是每墓一件。学者认为上述玉器多与礼仪用器和装饰有关，则它们在古城的普遍使用，证明当地先民对逝者的敛葬装饰已有若干定式，尤其在贵族集团中形成了以玉器为主的、形式复杂的敛葬仪俗^[24]。

古城区域外，新安桥、灯笼山、玉架山、普安桥、张陵山（东山与西山）、少卿山、高城墩等遗址均发现与之风格相近的玉琮、冠形器等，被推断为古城对各地的输出品（图二）。且此类玉器不在少数——以玉琮为例，不同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第一、二期古城外五分之一至半数者均属此类^[25]。而合计古城出土者，则古城制作的玉琮约占此时总量的60~80%或更高。但综观古城区域以



图二 古城区域玉琮与对外输出产品

1、2、6.瑶山M10:19、瑶山西区2841、瑶山西区2842 3、7.高城墩M13:12、13
4.张陵山东山T6:1 5.新安桥出土

外的贵族墓葬，多数并不使用冠形器、三叉形器等玉器，说明古城的敛葬习俗并未与输出玉器一样被各地贵族接受。相对而言，仅东苕溪流域和嘉兴西部的贵族对古城特色玉器的接受度较高：除古城区域，三叉形器仅见于这两个区域，冠形器在两区出土数量占良渚总量的28.5%，是古城以外最多者，只是此两区的使用不如古城普遍和规范^[26]。此外，两个地区随葬陶器组合也与古城区域相似，尤其在临平山聚落群中，后头山等遗址也随葬古城区域常见的特殊陶器——澄滤器。

广泛分布于环太湖地区、形式或繁或简的神人兽面图案，是以往推断良渚文化具有统一信仰的主要依据；基于古城区域此类图

案出土的较大数量，以及图像的完整性、复杂性，它又进而成为推断古城对外管控的重要证明。然而如果考虑到此种图案在古城区域的绝对优势，以及域外的刻纹玉器很多甚至大多为古城工业的输出品，那么它们实际难以代表古城政体的对外管控，或许它们只是古城区域输出的宗教用器。

至于古城玉器的输出路径，在河网密布的环太湖地区，流经古城的东苕溪无疑是一条重要的通道，且它在入太湖后还可抵达广大地区。而在良渚文化时期，顺流的舟楫交通，速度

和运力等应较一般陆路交通更高。古城周边专业的水利系统充分说明了先民已对水利有了相当的认识和利用，而东苕溪通道不只是作为玉器的输出通道，玉料、粮食等资源的运输均可使用，古城政体还可借助河流进行其他商贸，甚至移民和军事行为。观察流域内宏观聚落形态，古城所在“C”形盆地以北的东苕溪下游，聚落密度相对较小，且出土良渚文化早中期高等级玉器的聚落也较少（辉山、杨家埠等遗址所出玉琮属良渚文化晚期），这反映了下游区域人口较少，当地也无强势集体可对抗古城政体的管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古城政体的核心疆域应为其所在的“C”形盆地，该区域可为古城贵族提供粮食等主要物资和修建工程的

人力；而东苕溪下游区域也可能属古城政体的管控范围，甚至不排除古城政体强势时或可管控嘉兴西部的部分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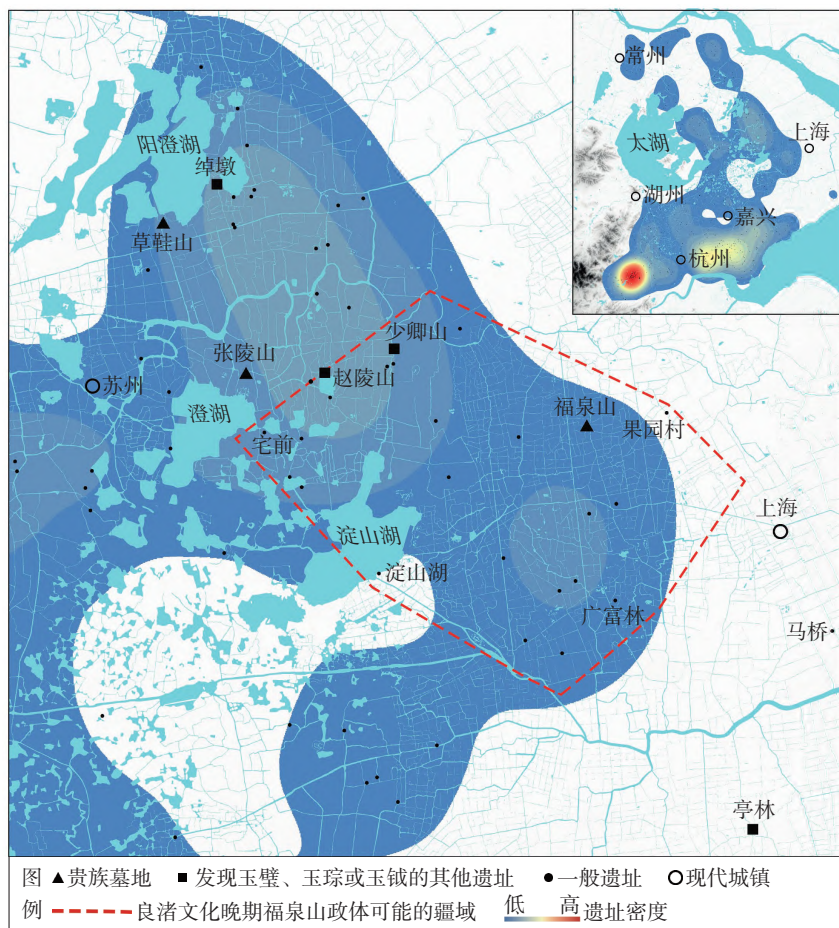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论述基本针对良渚文化早中期，由于古城中良渚文化晚期遗存相对较少，且在此时东苕溪流域出现横山、中初鸣等重要遗址，这时古城政体的情况还待进一步研究。

四、福泉山及周边区域

福泉山东距当时海岸线10公里左右，是良渚文化中一处少见的沿海高等级聚落；但它距环太湖地区南端的良渚古城及北端的寺墩均非常遥远，三者位置大体呈三足鼎立之势。福泉山遗址良渚文化中期的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27]，为良渚文化中几处面积最大的聚落之一。

福泉山所在的太湖东部地区湖淀尤多，与环太湖地区其他区域一样，它们与密集的河网构成了一系列天然的地理隔离带，使得本区与相邻地区之间以及本区内不同小区的聚落各自成群。相对古城区域及嘉兴南部地区，太湖东部地区整体聚落密度不高。地理信息系统核密度分析表明，本区密度最大的区域为阳澄湖—澄湖东侧区域（图三），这也与此区域前期发掘显示出的宏观聚落

特征相呼应：太湖东部地区中，此区域内发现的高等级聚落最多，张陵山（西山与东山）、赵陵山、草鞋山、绰墩、少卿山等遗址均有随葬大型玉器的墓葬。其中赵陵山、少卿山、绰墩墓地以中小型墓葬为主，并非专门的贵族墓地，随葬大型玉器者应为地方首领一类人物。张陵山和草鞋山有专门的贵族墓地，不过两者时代不同：前者属良渚文化早期，西山M4、M5及东山M1代表了此时太湖东部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28]；后者属良渚文化晚期，它与福泉山墓地一起，成为此时太湖东部等级最高的两处贵族墓地^[29]。相对上述区域，福泉山近周及南侧区域目前的遗址密度较低；虽然区域内也有较多调查和发掘工作，但福泉山至较远的亭林遗址之间



图三 福泉山周边区域的聚落分布和密度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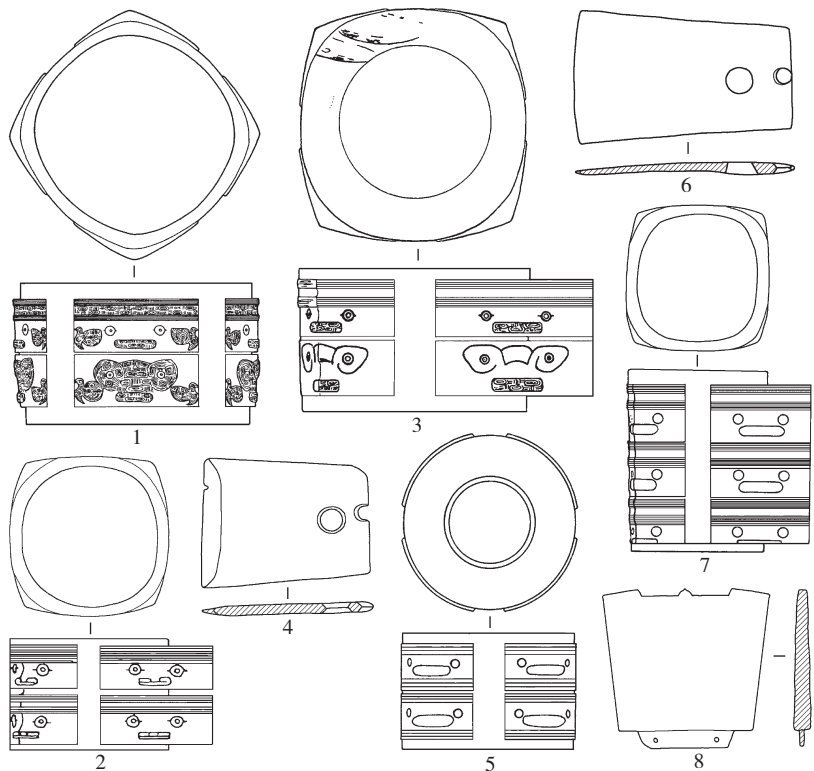
均未发现等级较高墓葬或其他线索，且即便亭林也以中小型墓葬为主，非专门的贵族墓地^[30]。

福泉山遗址自良渚文化早期沿用至晚期，贵族墓葬连贯不断^[31]，尤其在晚期，除福泉山外，还新辟了吴家场墓地。沿用时间如此之长与连贯的贵族墓地，目前在良渚文化中独一无二，显示出福泉山集团的稳定性。但如上所述，它实际处于阳澄湖-澄湖东侧遗址密集区的边缘，且临近海岸线。尤其在良渚文化早期，福泉山贵族墓葬与赵陵山甚至广富林部分高等级墓葬规格相近，可推断当时它可能为张陵山集团控制下的次级聚落。

福泉山晚期中心聚落地位形成的具体原因目前还难以推测，但太湖东部地区高等级聚落变迁历史，揭示出整个良渚文化时期本区的最高等级聚落在变动之中。此种情形与嘉兴地区相似，表明了两区内的政治集团应处于一种动态竞争的环境中，中心聚落的形成应基于社会竞争的胜利，福泉山晚期中心聚落的形成应为典型代表。至于这一时期福泉山政体的疆域，依据本区高等级聚落的分布以及地理隔离带的情况，大体推测北界应在与草鞋山的中间地带，西界可能在宅前-淀山湖一线，南界至广富林与马桥之间或更南，东界至果园村一线，即当时的海岸线（见图三）。

在高端产品方

面，福泉山的玉器显示出强烈的自身风格。有较多假玉质的玉琮、璧、钺；“柄形器”、角尺形器等器形为其他遗址不见或罕见；横截面近弧边方环形的玉琮、厚壁琮、平刃钺和近平刃钺、高胖型冠形器等为自身特色（图四，5、2、7、4、6、8）；与良渚文化晚期流行多节玉琮的风尚相悖，福泉山的玉琮均为单节或双节；玉器尺寸与纹饰方面，也表现出自身特点，常有少见或孤例者^[32]（图四，1、3）。总体来说，墓地中以具有自身风格的玉器为主，如辨识度最高的玉琮，其11件成品和半成品中（包括镯式琮M9：14、21），表现自身风格者就有8件。除玉器成品外，福泉山还出土有部分与制玉相关的遗物。上述情况均表明福泉山拥有自己的制玉工业。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数量还是质量，福泉山晚期玉器明显胜于早期者，具有自身风格的玉器也多属晚期。



图四 福泉山玉器工业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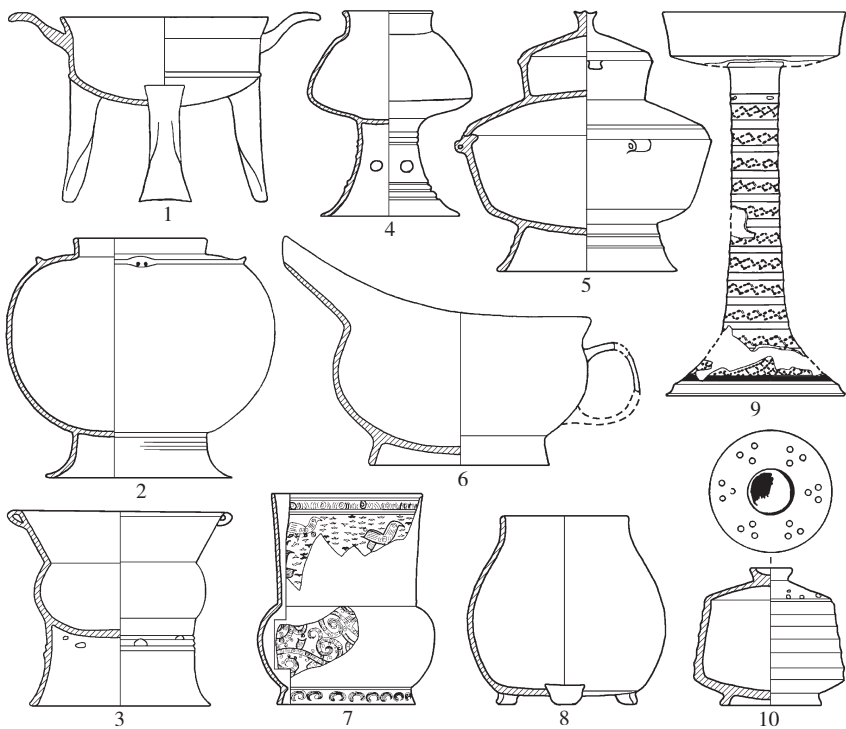
1~3、5、7.琮（M9：21、M65：49、M65：50、M40：91、M40：110） 4、6.钺（M109：15、M144：13） 8.冠形器（M101：39）

作为良渚文化晚期太湖东部地区最高等级的聚落之一，拥有自己的制玉工业是合乎其地位和需求的。但福泉山制玉工业有着先天的不利条件，即其所处平原的地质条件并非大规模玉矿的理想产区，这一限制也应是福泉山等太湖东部遗址玉器数量相对较少、品质相对较低的重要因素。面对这一不利条件，福泉山贵族选择了利用其他高端产品弥补缺憾。

弥补产品之一即高端骨牙器，吴家场M207、福泉山M9均出土了雕刻神人兽面纹的象牙权杖和器形不明的象牙器，前者还有人头盖骨碗、野猪獠牙器等重要骨器。由于骨牙器难以保存，可推测福泉山贵族墓葬中原有更多此类产品。与高端骨牙器相比，高端陶器自良渚文化早期就普遍出现于福泉山墓地中。这些陶器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有彩绘或细刻的精美纹饰，器形有鼎、豆、双鼻壶、阔把壶等常见陶器，用途应为礼仪性明器。除福泉山以外，此类陶器在周边的邱承墩^[33]、草鞋山、龙潭港^[34]等贵族墓葬中也有发现，但数量均不及福泉山。另一类高端陶器，有的器形整体特殊，有的器形虽常见，但具体形制与常见者明显有别。这类陶器典型者包括双耳凿足鼎、壶形豆、尊形豆、圈足四系罐、矮足罐形鼎、双重盖簋、大口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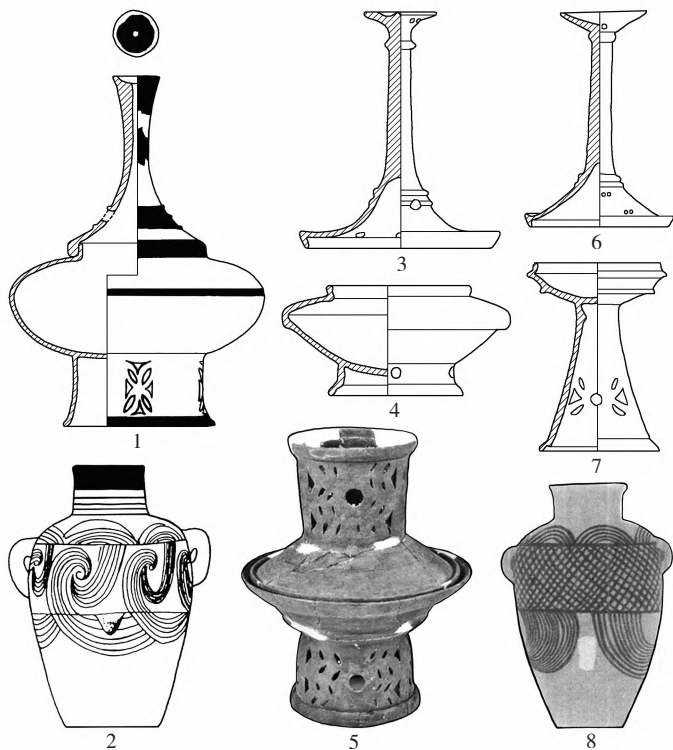
“熏炉式”簋、粗颈刻纹壶、高柄豆等（图五），均为整个良渚文化罕见或独一无二者。这类陶器无论是否属于明器，其罕见性都可表明它们是专属于某一墓主。整个墓地中，这两类高端陶器也较普遍，大多数墓葬内都有1~2件，较多者则有数件。

相对而言，福泉山多数高端产品的本地特征明显，可反映对外交流者则较少。笔者认为后一种遗物主要为2件高端陶器，即同属良渚文化第四期的高柄盖圈足罐（M101：2）与彩陶背壶（M67：46）。其中彩陶背壶与大汶口文化背壶的相似性早已被学者注意，尤其与邳县大墩子墓地M107：1极为相似^[35]（图六，2、8）。背壶为大汶口文化典型陶器，其他文化中较为少见；大墩子M107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期前段，M67则是福泉山墓地年代最晚的墓葬之一，两者的



图五 福泉山出土高端陶器

- 1.双耳凿足鼎（M143：13） 2.圈足四系罐（M150：10） 3.尊形豆（M139：41） 4.壶形豆（M139：42） 5.双重盖簋（M74：19） 6.大口匜（M74：26） 7.粗颈刻纹壶（M128：111） 8.矮足罐形鼎（M144：22） 9.高柄豆（M67：47） 10.“熏炉式”簋（M74：32）



图六 反映福泉山远程交流行为的陶器

1.高柄盖圈足罐(福泉山M101:2) 2.8.彩陶背壶(福泉山M67:46、大墩子M107:1) 3、6.器盖(城河M90:31、M224:17) 4.孟形器(城河M90:20) 5.扣豆(城河K3:4、5) 7.豆(城河M224:22)(3、4、6、7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湖北沙洋县城河遗址王家湾墓地2017~2018年发掘简报》图一五、图二六,《考古》2020年第6期;5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湖北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城址发掘简报》图六一,《考古》2018年第9期;8采自张明川:《中国彩陶图谱》图1904,文物出版社,2005年)

时代差距较大。因此笔者推测,彩陶背壶最初可能由大汶口文化区获得,作为“珍奇之物”被珍藏了很长时间,最后才被随葬。高柄盖圈足罐为灰胎黑皮陶,造型精致,由盖、罐两部分组成(图六,1)。盖为长柄盖,顶端有一透气孔。此类器盖良渚文化中极为少见,而在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中,尤其洞庭湖西北的澧县-荆州区域较为流行,常与孟形器、豆、杯等器形扣合(图六,3~7)。M101:2之罐为高圈足鼓腹状,在良渚文化中较少见,但较常见于屈家岭文化中,并多带盖,或称孟形器(见图六,4);另外,此罐圈足上的弧边三角-水滴状镂孔,与良渚文化常见且主要流行于早期

的三角-圆形镂孔不同,也流行于屈家岭文化中,尤其是上述澧县-荆州区域(见图六,5、7)。总之,高柄盖圈足罐为一件明显的屈家岭文化风格器物。当然,与长江中游的同类陶器相比,它还有一些自身特点;因此笔者推测,此罐可能是福泉山先民借鉴屈家岭文化陶器仿造的,但M101墓主无疑与长江中游有某种密切关系。

虽为陶器,但对于随葬器物的墓主而言,其意义已远超出工艺精致、造型优美的普通随葬品。无论为长途运输而来或本地人群仿造,无论作为战利品、当时的“古董”或具其他功能,它们都可反映出福泉山贵族的长距离交流能力。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福泉山墓地第四期的五座墓葬中,除残墓M128外,M9与M40均同时随葬玉琮、钺及璧,而随葬此两件陶器的M101与M67(被扰)恰恰目前仅有玉钺或半成品玉琮。所以,这两件陶器当时被

视为与玉琮等大型玉器意义相当的物品,还是较玉器低一等级的器物,值得深思。但考虑到福泉山墓地的综合高端产品使用策略以及四座墓葬的面积大小——尤其M67墓圻最大,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如此则可说明,以随葬玉器为衡量墓主地位的主要标准至少并不完全适用于福泉山贵族集团。

综上,虽未发现宫殿、城墙等大型建筑,但遗址具有自身风格的玉器工业和用玉习俗,同时执行多种高端产品并用的策略;尤其它在太湖东部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在高等级聚落变迁历史中的地位,其体现的长距离对外交流能力,均指向福泉山政体的独立性。而且如上所述,福泉山应代表了一个

基于竞争胜利的政体，并可能在良渚文化晚期才获得独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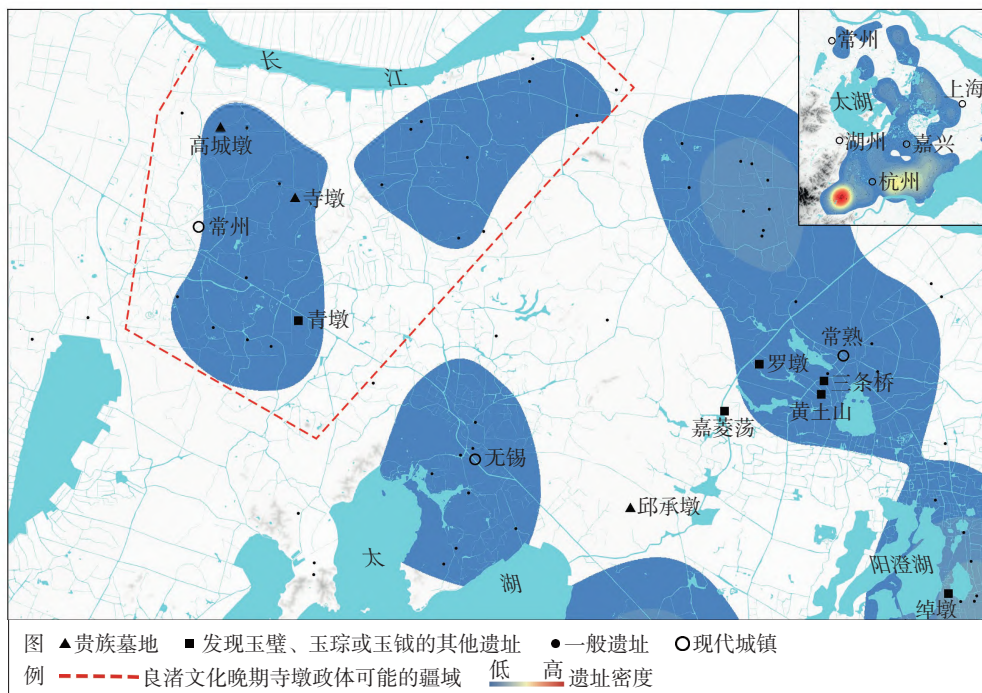
五、寺墩及周边区域

寺墩遗址近年的考古工作大致明确了其范围与结构，遗址面积在150万平方米左右，为拥有内、外两重河道环绕的特大型聚落^[36]。这与车广锦有关寺墩遗址布局的认识较为相近^[37]。同福泉山一样，寺墩遗址的具体结构还待今后工作加以确认，但其在整个良渚文化聚落中极高的地位已愈加明确。

寺墩所在的太湖北部地区，良渚文化时期遗址较其他地区明显稀疏，密度为各区最低；近年来对寺墩邻近区域的详细调查也未发现太多遗址，可见良渚文化时期本区聚落的真实情况大致如此。本区目前发现的聚落可明显聚合为五个左右的聚落群。但寺墩所在聚落群并不居于本地区中心，而是偏于西北一角。本区中心区域恰为一处大型的空白带，甚至到历史时期仍然城镇稀疏。据寺墩较近且更偏于西北的高城墩，是太湖北部良

渚文化早期唯一明确的专门贵族墓地，其年代大约为良渚文化第一期晚段至第二期，而寺墩目前发现的贵族墓葬，时代大约为良渚文化第三期晚段至第四期，两者年代的大体衔接以及仅约10公里的距离，说明良渚文化晚期的寺墩贵族集团有可能由高城墩迁移而来（图七）。

除两遗址外，据悉寺墩以南的青墩遗址曾出土玉琮、璧，但具体情况不明，或许也有地方首领一类墓葬。与寺墩较远的邱承墩为良渚文化第四期时的专门贵族墓地，有玉琮、钺及璧同出的大墓3座，从随葬品数量和质量看，其等级与寺墩贵族墓葬大致相仿；邱承墩东北的嘉菱荡、罗墩、三条桥、黄土山遗址也出土或采集到少量玉璧、琮等。上述五处遗址相对较近，应构成另一处单独的聚落群。除上述者，太湖北区其他遗址的情况均不清晰^[38]。根据本区聚落呈现的分布形态，暂时推断寺墩为太湖北区良渚文化晚期西北部聚落群的中心，其管控范围可能北至长江，东至张家港，南至无锡，西至



图七 太湖北部地区的聚落分布和密度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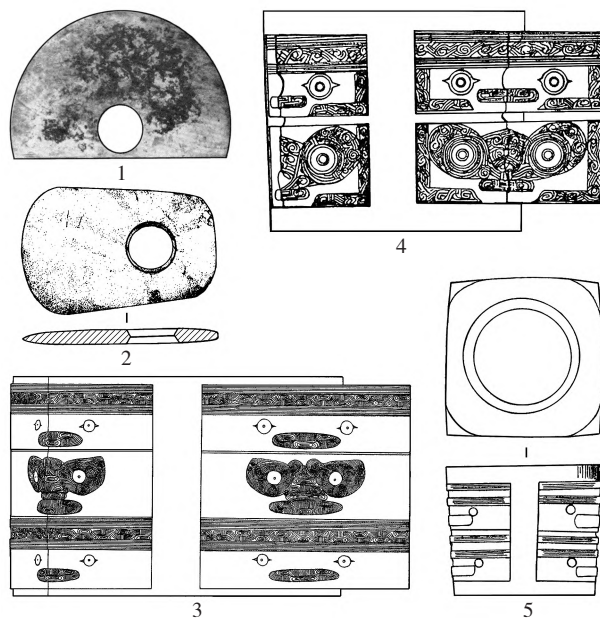
常州一带（见图七）。

寺墩遗址20世纪遭到较严重破坏，但仍采集、发掘到大量玉器^[39]。墩东发现的4座贵族墓葬仅M3保存较完整；M1仅在约0.5米×1米的范围内出土随葬品10件，应为残墓；1973年春墩东出土的30多件玉器（玉琮、璧各十余件）据发掘者判断应出自M4；M5发掘时仅余西半侧；而1979年9月遗址第二次发掘后，墩东还出土玉璧4件和琮1件，归属情况不明，也可能为另外的墓葬。除墩东外，1978年9月，墩北电灌站北低地出土玉琮、璧三组，约20多件，应为另一处贵族墓地。由已知玉器统计，除反山外，寺墩为良渚文化贵族墓地中出土玉器总体量第二大者。但考虑到墓葬被严重破坏，如果以保存最好的M3及发掘者复原的M4代表墩东墓葬原有玉器的平均数量，则它们会超过反山墓地多数墓葬。此外，寺墩出土玉器主要属良渚文化晚期，尤其是第四期；以出土玉琮和玉璧计算，其比例约为第四期出土总量的70%，甚至超过了良渚文化早中期时古城区域出土大型玉器的比例。

除数量较多、体量巨大外，寺墩玉器也体现出若干自身风格。如玉琮M4：1和M5：13图案为良渚文化中孤例（图八，4、3），或仅与横山圆环琮M2：11相似；M1：3（图八，5）、寺：21等单节或双节琮形制和尺寸独特；大孔圆钝玉钺（图八，2）和切半玉璧（图八，1）也为良渚玉器中的孤例；寺墩玉璧总体尺寸较大并有特大者，寺：17、M5：50均为少见的超大型玉璧^[40]。总之，虽然寺墩玉器以特征辨识度较低的玉璧和多节玉琮为主，但仍显示出自己的风格，说明其拥有自己独立的玉器来源途径。

寺墩的玉器工业除上述特点外，在器形的比例上也有明显的特色：以大型的琮、璧、钺为主，锥形器等中型玉

器匮乏，管、珠等小型玉器数量也不多。以保存较好的M3为例，大型的琮、璧、钺有60件，中型玉器仅有镯、锥形器、坠9件（不含应为钺镞和瑁的所谓“带槽玉器”和“格饰”），小型的珠、管仅40件。尤其小型玉器，与反山墓地大多墓葬动辄上百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由于管、珠等小型玉器，可利用边角料制成，所以丰富的小型玉器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玉器生产的存在，古城区域就是如此。而寺墩的情况暗示遗址本身可能并无玉器生产行为，玉器大多为外地输入。此外，还有三种线索也指向相近的结论：其一，太湖北区与太湖东区的地质条件一样，仅有零星的孤立山丘，不是大型玉矿产出的理想区域。其二，本区良渚文化早期高城墩墓地中就有较多玉器来自古城地区，表明此区域有输入玉器的传统。其三，寺墩遗址未见钻芯、半成品、边角料、工具等与制玉相关的遗存，但其西侧的丁沙地为明确的制玉地点，磨盘墩应是为制玉地点制作燧石工具，宜溧山区的小梅岭则存在明确玉矿——即寺墩西侧区域既有玉矿，又存在玉器加工



图八 寺墩遗址出土相关玉器

1.璧（寺：6） 2.钺（M3：42） 3~5.琮（M5：13、M4：1、M1：3）

地点。综上，笔者推断寺墩玉器可能主要来自西部的宁镇-宜溧地区，输入形式主要为玉器成品输入。

综合以上分析，寺墩遗址所出玉器的产业状况表明，寺墩政体的形成可能与古城一样，主要基于对玉器资源的控制。但与古城政体相比，太湖北部地区稀疏的聚落说明寺墩政体更加缺乏社会基础；加之它的玉器主要为输入而非自产，寺墩政体并不一定能够控制其西侧的玉器产地；这两点区别或许正是寺墩聚落相对较小、延续时间相对较短的重要原因。

除了玉器产品显示的对外交流，寺墩遗址近年来发现数件刻划“日火山”和“羽冠”等图案的大汶口文化陶尊残片。在良渚文化中，此类刻符陶尊尚为孤例，无疑表明了寺墩与大汶口文化的某种交流。而在长江下游，刻符陶尊之前还见于宁镇地区与寺墩大致同期的北阴阳营遗址中^[41]。而无论作为寺墩与大汶口文化交流的中继地区，抑或同受大汶口文化影响的区域，刻符陶尊的同时发现都进一步体现出宁镇地区与寺墩政体的密切关系。

六、结 语

中心聚落玉器工业和高端产品的研究表明，良渚古城与寺墩政体的兴起均与对玉器资源的控制密切相关，这应是它们中心聚落形成和政体运作的主要动力，此类政体可称为关键资源支撑型政体。相比之下，福泉山虽然拥有自己的玉器工业，但其数量相对较少，且当地贵族采用了象牙器等其他产品并用的高端产品使用策略。而福泉山周边区域宏观聚落形态及其变迁过程分析，揭示了其晚期中心聚落形成的重要背景，即它兴起于较强的社会竞争环境中，政体形成和运作的主要动力主要来自于其社群内部，更多应与人口繁增、军事胜利等竞争因素有关，而非某种重要的外部资源。除福泉山之外，太湖

东部地区及嘉兴地区，很多中心聚落都表现出相似的特征；相似的政体均可称为竞争内生型政体。

综合本文分析，笔者认为，位于太湖南部、东部和北部的良渚古城、福泉山和寺墩代表了三个时代有异、相对独立的政体。上文也大体划定了三个政体可能的管控范围。而在这些范围之外，三个政体中有限的若干线索目前已能表明，三者均有一定的长距离对外交流能力。这种能力一方面也是其政体实力和相对独立性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无论其交流的产品为自产或输入的成品玉器，抑或高端陶器，都是构建良渚文化或更大区域内政治网络的重要证据。而伴随着下一步研究的深入，如对“个性”辨识度不高的玉璧和多节玉琮的玉料产地和制作产地分析的深入，此类证据将会更加清晰地呈现良渚社会的政体结构及其之间的关系。

附记：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彭小军的谈话中，笔者进一步确定了福泉山陶高柄盖圈足罐M101:2与屈家岭文化同类陶器的关系；复旦大学陈淳教授向笔者引介了国外关于政体界定的若干理论和案例。在此谨向两位师友表示感谢！

注 释

- [1] a.严文明：《良渚遗址的历史地位》，《浙江学刊》1996年第5期。
b.陆建方：《良渚文化墓葬研究》，见《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 [2] a.张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五千年前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文物》1995年第5期。
b.张之恒：《良渚文化聚落群研究》，见《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 [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遗址2006~2007年的发掘》，《考古》2008年第7期；《杭州市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考古调查》，《考古》2015年第1期；《瑶山》，

- 文物出版社, 2003年;《反山》, 文物出版社, 2005年。
- [4] 科林·伦福儒、刘斌著, 陈明辉等译:《中国复杂社会的出现:以良渚为例》,《南方文物》2018年第1期。
- [5] 赵辉:《良渚的国家形态》,《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第3期。
- [6]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第204、205页, 文物出版社, 2004年。
- [7] a. Johnson G. A., A Test of the Utility of Central Place Theory in Archaeology, in *Man, Settlement, and Urbanism*, Duckworth: London, 1972.
b. Willey G. R., Settlement Pattern Studies and Evidences for Intensive Agriculture in the Maya Lowland, in *Archeological Thought in Americ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89.
- [8] Renfrew C., Level V., Exploring Dominance: Predicting Politics from Centers, in *Transformations: Mathematical Approaches to Culture Change*, pp.145-167,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9.
- [9] a. 赵春青:《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b. 刘莉著, 陈星灿等译:《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 文物出版社, 2007年。
- [10] a. 燕生东等:《桓台西南部龙山、晚商时期的聚落》, 见《东方考古》第2辑, 科学出版社, 2005年。
b. 李伯谦:《关于文明形成的判断标准问题》, 见《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第一辑)——纪念新砦遗址发掘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科学出版社, 2010年。
c. 郭明建:《山东薛河流域古今聚落的比较研究与启示》,《南方文物》2020年第5期。
- [11] a. 张海:《数学计算模型与二里头早期国家的疆域》, 见《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第一辑)——纪念新砦遗址发掘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科学出版社, 2010年。
b. 王青:《豫西北地区龙山文化聚落的控制网络与模式》,《考古》2011年第1期。
c. 鲁鹏等:《环嵩山地区9000a.B.P.-3000a.B.P.聚落规模等级》,《地理学报》2012年第10期。
- [12]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第209页, 文物出版社, 2004年。
- [13] Smith M. L., The Archaeology of South Asia Citie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14(2), 2006.
- [14] 对这些空间间隔——聚落群之间的空白地带的进一步考察可看到, 这些地带少数与近现代城镇的城区扩张有关(如杭州市区和嘉兴市区周边), 这些区域或许在良渚文化时期有部分遗址存在; 但大部分地带自东周时期至今多为城镇稀疏、乡村为主的区域(环太湖区域主要城县的地理位置在历史时期较为固定), 并多有密集的河道湖淀。
- [15] 郭明建:《良渚文化宏观聚落研究》,《考古学报》2014年第1期。
- [16] 同[5]。
- [1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 文物出版社, 2005年;《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 文物出版社, 2019年。
- [18] 良渚文化可分为四期, 每期又分为两段。对应三分法, 则第一期至第三期早段为早中期, 余为晚期。对应两分法, 则第一、二期为早期, 余为晚期。
- [19] a. 中村慎一著, 刘恒武译:《良渚文化的遗址群》, 见《古代文明》第2卷, 文物出版社, 2003年。
b. 秦岭:《良渚玉器纹饰的比较研究——从刻纹玉器看良渚社会的关系网络》, 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 科学出版社, 2006年。
- [20] 郭明建:《良渚文化玉器工业初探》, 见《东方考古》第15集, 科学出版社, 2018年。
- [21] 闻广:《中国大陆史前古玉若干特征》, 见《东亚玉器》中册,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1998年。
- [22] a. 方向明:《聚落变迁和统一信仰的形成:从崧泽到良渚》,《东南文化》2015年第1期。
b. 郭明建:《良渚文化玉器产地的综合分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7期。
- [23] 同[19]a。

- [24] a.刘斌：《神巫的世界——良渚文化综论》，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年。
b.蒋卫东：《神圣与精致——良渚文化玉器研究》，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年。
c.方向明：《良渚墓葬》，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
- [25] 同[19]。
- [26] 同[20]。
- [27] 上海博物馆：《上海福泉山遗址吴家场墓地2010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10期。
- [28] a.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见《文物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
b.南京博物院、甬直保圣寺文物保管所：《江苏吴县张陵山东山遗址》，《文物》1986年第10期。
- [29] 南京博物院：《苏州草鞋山良渚文化墓葬》，见《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 [30] 同[15]。
- [31]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
- [32] 同[20]。
- [33] 南京博物院等：《邱承墩——太湖西北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
- [3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盐县博物馆：《浙江海盐龙潭港良渚文化墓地》，《考古》2001年第10期。
- [35] 栾丰实：《论大汶口文化和崧泽、良渚文化的关系》，见《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 [36] 南京博物院、常州市考古研究所：《江苏常州天宁区寺墩遗址2019年度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22年第5期。
- [37] 车广锦：《玉琮与寺墩遗址》，见《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 [38] 同[15]。
- [39] a.南京博物院：《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年第3期；《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
b.江苏省寺墩考古队：《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第四、第五次发掘》，见《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c.陈丽华：《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物》，《文物》1984年第2期。
- [40] 同[20]。
- [41] 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第87页，文物出版社，1993年。

（责任编辑 李学来）

○信息与交流

《开州余家坝》简介

《开州余家坝》（全2册）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编著，科学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本书为16开精装本，正文538页，字数约157万字，文后附彩色图版284页，定价628元。

本书是重庆市开州区余家坝墓地的发掘报告。报告在介绍余家坝墓地发掘过程的基

础上，以墓葬为基本单位，全面、系统地公布了战国时期257座墓葬的全部发掘成果，为研究重庆市乃至整个长江三峡地区的巴人和巴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此外，报告还收录了几篇关于余家坝墓地出土青铜兵器的检测、分析和研究报告。

（雨 珩）